

郭沫若：在文学与政治背后的医学眼光

陈 俐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四川, 乐山 614000) ¹

摘要：郭沫若在日本有过近八年的医学留学生涯，接受了严格的医学和科学思维的训练，这为他打量社会百相、治病救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观察疾病时，他揭示疾病的自然真相，是疾病隐喻的批判者；从文学的角度处理疾病时，他以大量疾病意象承载着情感与理性的矛盾冲突。小说中“结核美女”既是欲望的对象，又有“禁忌”的性质；抗战时期，在其互渗思维作用下，大量的医学话语又转换成政治和军事的隐喻，伤口的“溃烂”与“治愈”成为民族死而复生的形象表达。

关键词：郭沫若； 疾病； 早期小说； 抗战时期

目 录

I 引言：

II 作为“医科学生”和“病人”的郭沫若

III 早期小说中疾病意象的双重性质

IV “腐肉去尽，新肌发生”的民族隐喻

V 结语

I 引言

郭沫若评论鲁迅的大量言论中，最中肯、最精辟的莫过于在《契诃夫在东方》一文中的见解，他特别注意到了鲁迅和契诃夫相似的医学经历：

他们都是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医学家的平静镇定了他们的愤怒，解剖刀和显微镜的运用训练了他们对于病态与症结作耐心的无情的剖检。他们的剖检是一样犀利而仔细、而又蕴含着一种沉默深厚的同情，但他们却同样是只开病历而不处药方的医师。

这大约是由于环境与性格都相近的原故吧。两人同患着不可治的肺结核症而倒下去了，单只这一点也都值得我们发生同情的联想。这种病症的自觉，对于患者的心情，是可能发生一种同性质的观感的。内在的无可如何尽可能投射为世界的不可救药。就这样内在的投射和外界的反映，便交织成为惨淡的、虚无的、含泪而苦笑的诗。¹⁾

²⁾从医学和病人的角度对鲁迅精神的概括和理解：使郭沫若过滤了意气用事

¹⁾ 郭沫若. 契诃夫在东[A]. 北京：沫若文集第13[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68)

的杂质，避免了情感的偏见。这使我们也得到一个启示，对郭沫若的评价，是否也可作如是观呢？中国现代史上有大量被我们称作“文学家”的人，其实并不一定以文学为职业，但是因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被人称为“文学家”后，其身份似乎固定于此，其评价视角和标准也就成为定见，而本来拥有的其它身份则被遗忘。郭沫若先是弃医从文，尔后又治学，又从政，但最早因文学而成名，所以后来的评论者一直津津乐道于文学家的郭沫若，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他其它身份。长此以往，定见则变成偏见。

II 作为“医科学生”和“病人”的郭沫若

郭沫若曾对于自己常被人称为“××家”，感到很无奈，在离开上海到日本避难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

安娜买回高界的《资本论》二册，读《商品与价值》一章终。——内山对她说“很难懂，文学家何必搞这个”。我仍然是被人认为文学家的。1)

显然，当时已经拿起了枪杆子的郭沫若对别人将他看成一个“笔杆子”很不以为然。虽然后来关于郭沫若是“××家”的种类又大大增加，但单纯将他简化成“××家”，确实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奇才。而大量的头衔中，人们恰恰遮蔽了他作为医科学生的事实。从1914年7月东京一高医科预科到1923年3月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以8年的时间，在日本学习了一系列自然科学课程，接受了严格的医学训练。郭沫若回忆道：

在医科开始的两年很感兴趣，那时所学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人体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开发了。我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也观察过无数片的显微镜片；细菌的实习、医化学和生理的实习，都是引人入胜的东西2)

郭沫若弃医的直接动因首先是因为身体的疾病影响，而不像人们常说的完全是出于文化启蒙的宏大目标。17岁那年，由于重症伤寒导致中耳炎，严重地损伤了他的听力。1928年，他又一次患上很严重的斑疹伤寒，听力再一次严重受损。他的病“在医学发达的国家本是容易治好的一种病态，然而因为我是生在中国，结果是成为了半聋。”3) 这样的悲剧落在郭沫若这一个体身上，具有一种荒诞性：因为中国医学的不发达，而落下耳疾；又因为耳目疾，使他无法以医生的身份去改变医学落后的状态。

³其实当郭沫若放弃从医的念头，开始歧路人生时，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医

²郭沫若. 离沪之前[A]. 郭沫若日记[Z].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512) 郭沫若. 学生时代[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11) 3)]郭沫若. 赞天地之化育[A]. 北京：沫若文集第13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3)

³1919年夏天，郭沫若曾向富子谈了想改入文科的想法，遭到富子的反对。佐腾富子曾回忆当时

生本是一个既利己（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又利它（能治病救人）的职业。而文学创作则是一个“觉他”（启蒙国民，治病救国）的事业。弃医从文，意味着十年苦读的黄金岁月全部付之东流，意味着他将过着飘流不定的生活，而且“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苗叶的希望了”。因为全家人生计问题，弃医从文曾受到妻子安娜的反对，但当安娜认识到丈夫的耳疾终究不适合从事这一职业时，则顺从了丈夫的选择。1) 对郭沫若而言，他何尝不愿意求得稳定的收入来养活家人，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出于生理原因的不可抗拒的因素，他的本能爱好以及关于“治病救国”的民族想象，更让它难以释怀，在那个追求崇高的时代，“扫天下”毕竟比“扫一屋”更值得付出。所以当他临毕业之际，收到国内寄来的请帖，欲以三千日元聘为医生，坚决予以拒绝。2) 家中寄来三百元，希望他回四川，就职于重庆一家红十字会医院，郭沫若也坚决放弃了。

当然，郭沫若对文学的强烈兴趣以及对于社会改革强烈愿望也是他弃医从文的重要原因。学医期间，面对着解剖室里的毫无血肉的尸体，他的幻想向“人性”和“民族性”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将想像、梦幻大量地引进小说。如最早构思的小说《骷髅》，其基本情节完全是集浪漫、惊悚、言情为一体的爱伦坡式小说；二是当时流行的关于“东亚病夫”的民族想象。外族将中国看成是“东亚病夫”，中国人自身也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愤激地承认自己是“东亚病夫”。

《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干脆就将自己笔名取名为“东亚病夫”。这样的疾病隐喻刺激着郭沫若。在显微镜下，它构思了反殖民侵略小说《牧羊哀话》。在冰冷的解剖室中，他吟诵出了热血沸腾的诗歌：

解剖室中

解剖呀！解剖呀！快快解剖呀！
快把那陈腐的皮毛分开！
快把那没中用的筋骨离解！
快把那污秽了的血液驱除！
快把那死了的心肝打坏！
快把那没感觉的神经宰离！

的心情：“沫若当时听到苦着脸说：我的耳朵不好，用听诊器是很讨厌的！这句话一直打到我的心底，我听后顿时吃了一惊——不要坚执地反对他罢！”郭佐腾富子：《怀外子郭沫若先生》，转引自：靳明全《文学家郭沫若在日本》，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参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08-109）

41) 郭沫若。解剖室中[A]。上海：时事新报·学灯[N]，1920年月1月222)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A]。北京。沫若文集第10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06）3) 郭沫若

快把腐败了的脑筋粉碎！
分开！离解！驱除！打坏！宰离！粉碎！
快！快！快！
快唱新生命的欢迎歌！
医国医人的新黄歧快要诞生了！1)

虽然弃医从文，但郭沫若从心底里并不轻视医学。三十年代后，他冷静而客观地回顾自己的医学生涯时，改变了早期弃医从文时痛骂医生的极端态度，认为医学“是对于人类幸福最有直接贡献的一种科学”，道出“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渐渐坚强起来。我研究医学是更想对于人类社会直接尽我一点对于悲苦的人生之爱怜”。2) 并很自信的说“虽然我没有行医，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我是衷心尊重医学的一个人。”而且，尤其向往“当临床医生时，一定要专修小儿科，因为小儿是新鲜的一代，小儿的病都不能由小儿负责”。3) 1940年，郭沫若先生通过川籍著名作家沙汀先生转赠给成都市著名儿科医生陈序宾先生一幅行草单条。4) 原文无标点，内容字体书写如下：

近代医术中余最心醉于小儿科颇觉有圣者风度小儿患病非由自得而又不能
详述其痛楚必须细心体贴方能究其症结儿科医中知此意者殆鲜

序宾先生

郭沫若

失之桑蚕，收之东榆。他后来在多个领域的多方面的巨大成就，都和他作为病人和医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有关。耳疾对于一个文学家而言，倒不是怎样的坏事，反而助长了他的浪漫天性和直觉思维。因为耳疾，听不到外在世界的声音，少了些⁵外在干扰，他可以直接地退回内心，捕捉思维和想象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热烈渴望着表达自己，希望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不仅在文章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情状态，在演讲中更是充满着狂暴恣肆的呐喊。在某种程度上，身体的缺陷，导致他灵魂的迷狂。外界的无声，使他对声音充满着幻想和崇拜。他的我行我素，他的任性而为，他不在乎别人的反应，而且豪无顾忌

沫若。赞天地之化育[A]. 北京：沫若文集第13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43）4陈序宾大夫建国后为成都市特等劳动模范、曾任四川省、成都市两级政协委员。1983年仙逝。其子陈先泽（原成都市科委主任）于2001年6月11日将此真迹送去装裱，不慎丢失在出租车上，久寻未果。此幅书法作品未见公开面世，其真迹已丢失。

⁵郭沫若。樱花书简·第六十三封[A]. 黄高斌、唐明中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168

地表达自己纯粹的感受。一如当年歌德评论拜伦“愤世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温柔到了优美感情的最纤细动人的地步……”

而在医学方面的严格训练，又培养了郭沫若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在日本系统和漫长的专业训练不可能不影响郭沫若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而这两者的结合，使郭沫若摆脱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弊端，成就他敢于实践、勇于探索的品格。成就了他成为向多个领域探索的球形天才。就是在文学领域中，我们也看到医学知识和科学思维带给他特殊的视角和特别的题材，那就是对疾病的关注。

由学医获得的专业性眼光，使郭沫若尤其注重从病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关注疾病的发病机制及社会环境。1921年，在日留学的郭沫若接到家信，得知家中亲属病歿，郭沫若去信以专业的医学知识分析并指导：

三姐的风泉侄女不料竟长到十七岁，不料长到了十七岁竟致夭折，读信不禁凄然。…风泉侄女得的怕是肺病。我家大伯和九婶，都因肺病结核，此肺结核的微菌竟隐伏于吾家而未根绝。从前，前王氏五嫂也正是受此传染。儿想我家中各间房屋均宜消毒才行。凡大伯与九婶所住过的房舍，尤宜严行消毒。不然在我家中会遗害于无穷，真是可怕。1)

在郭沫若的家族中，不仅有他在这封信中提及的上述亲属，还有他的幺弟郭翊昌，九婶家的女儿杨二妹，都是因肺病而死。故郭沫若后来在《悼杨二妹》诗中有“白色蔷薇蠹在心”之说。他将杨二妹比做白色蔷薇，将结核病菌比做蛀虫蚕食人的主要器官。郭沫若的故乡乐山沙湾多雨，四季以阴为主，而郭宅建筑又是连之以四进的四合院，每进中间留以十来见方的天井通气，终日很少阳光，家中通气、通风不够，造成病菌繁衍，以致家中多人传染患病。本来郭沫若的父亲就是一位无师自通的中医生，常常为乡亲们看病处方，但中医与现代医疗卫生知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系统。碰上大规模的传染性疾 病，以个体从业的中医往往束手无策。郭沫若不仅从病理学的角度，非常具体地分析了亲属患病的原因，⁶还用西医知识教家人如何消毒，以绝病菌。并交待通气和向阳是减少病患的自然方法。

不仅如此，郭沫若还从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病因，在于当事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缺乏基本的防疫和医疗知识才造成了无谓的死亡。在《少年时代》中，提及五嫂的死因，他非常沉痛地说“无论哪一个原因，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他以亲属为例，说明疾病的流传与社会愚昧是联系在一起的。

⁶郭沫若. 到宜兴去[A]. 郭沫若日记[A].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1998 (222) 郭沫若. 湖心亭[A]. 郭沫若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12

世纪末，由于波德莱尔著名诗集《恶之花》的出版，整个推进西方的审丑学，将城市看做是“恶之花”的诗歌意象在全球流行。郭沫若从对波德莱尔诗歌的阅读中受到启示，对中国社会病相的揭示更加频繁，社会“大病院”的意象大量地在其作品中出现。作为二十年代刚从具有洁癖的日本回来的医科毕业生，对随处可见的脏、乱、差现象，其感受尤为强烈。哪怕一个小小动作，也让郭沫若大跌眼镜。在出行沪、宁调查的途中，在电车上他观察到：

一位中年男子把头一埋便擤起鼻涕来。不幸，或者是他的大幸，他的鼻涕飞溅到姑娘的衣裳上去了。青绸羊皮袄的脚边上带了一珠，中年男子赶快把手绢拿出来替她揩了。姑娘又把左脚翘起来，绿色的绒线鞋子上又有一珠。中年男子又赶快把一只手去接着她的脚，又用手绢去替她揩了。揩了之后，——啊，完全出人意外！这位中年男子把那张乌黑的手绢产地拿到自己的鼻子下面去了！1)

在小说《湖心亭》中，他叙述在湖心亭的所见之景：之字曲桥，成了“一个宏大的露天便所”！湖水更是“混浊得无言可喻的了”，面对这种情景，作者愤慨地评论道：

“——哎，颓废了的中国，堕落了中国人，这儿不就是你的一张写照吗？古人鸿大的基业，美好的结构，被今人沦化成为混浊之场。这儿汹涌着的无限的罪恶，无限的病毒，无限的奇丑，无限的耻辱哟！”2)

在《孤山的梅花》中，“社会大病院”的景象在中国一节火车厢里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小说中艺术家的“我”怀着如火的激情将要去与想象中的爱人相会，医学的专业性眼光却让他发现自己置身在一车病人中间。枯瘦如柴的人与眼珠飞金的黄疸病人讨论着用稻草灰治病的迷信土方，“我”试图从医学知识破解这乡下医方的玄妙，最终推想不出究竟来。周围咳嗽声此起彼落，满是疑似肺结核患者。“我”感叹道：“啊，我真好象是坐在病院里一样的呀！病夫的中国，痨病的中国，这驾三等车便是缩小的中国！”在这样的比较中，作者用医学和社会改革的双刃刀对国民性和民族的社会病相进行了有力的解剖，诗人的浪漫和医生的冷静形成强烈的反讽。

III 早期小说中疾病意象的双重性质

肺结核作为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全球爆发的流行性疾病，不仅在人类身体器官留下的浓厚的阴影，而且弥漫到人类灵魂，诱发了文学家们巨大的精神幻想。疾病现象一旦和情感相联系，就成为承载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的表象。曾是医科学学生的郭沫若，从病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打量中国的病象和病

因，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来还原疾病的本相，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揭穿了疾病隐喻的谜底；但郭沫若作为政治家在批判社会病状，并从文学的角度展开关于疾病的想像时，他又在制造关于疾病的隐喻。在郭沫若早期的小说中，我们常常看到作者化身为作品中的“我”，同时以文学和医学的双重视角透视疾病，形成疾病描写的悖论。

《落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篇具有浓烈的歌德色彩的摹仿之作，少年维特的影子在主人公洪师武身上时隐时现。小说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的中心事件是以第一人称叙述“我”的好友洪师武在日本的种种际遇，包括介绍洪师武与一位日本姑娘菊子的爱情故事的由来。另一部分是菊子姑娘写给爱人洪师武的四十一封信。临死时将姑娘的四十一封情书转给“我”，希望能将他的故事写成文字留传下去。于是这四十一封情书构成小说的第二部分。

人们常常将阅读的焦点放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而洪师武患病且被误诊的这一部分的重要意义常被人忽略，实际上这一部分的故事简直为印证桑塔格（美国女性文化批评家）的见解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文本。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一书，由社会对疾病喻性思考和流行观念带给人普遍的精神伤害作了深入分析，在我们看来司空见惯而又理所当然现象，在桑塔格笔下成为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精神摧残。桑塔格在该书所作的理性思考和分析，郭沫若早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到，并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落叶》的主人公洪师武是旧制度婚姻的牺牲者，因为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自暴自弃，终于得了花柳病，被医生误诊得了梅毒。这些“下半身”病往往被人们视作道德败坏的结果而加以唾弃。于是病人被判了精神的死刑，。因为道德的遣责和深深的忏悔，他几次想自杀，后来才转念想以自己的残躯奉献于人，于是不怕疾病传染，勇于献身，去照顾一位肺结核患者。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看护姑娘爱上了他，而洪师武认为不洁之身不配消受纯洁的爱情，所以选择逃离。这位姑娘火热的情爱受到拒绝，又不明究竟，也出走南洋。后来洪师武去学医，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世人。他自己成为医生后，才知道自己的病是被误诊了。这时，洪师武已经在护理病人的过程中，被传染上肺结核，且已是晚期。主人公爱情不可得，以死亡的悲剧告终。对主人公身世这样的安排叙述，表明小说作者曾有过的职业训练在潜意识中起到作用。从医学角度来看病人，他对主人公被误诊后的精神重负进行了真实的描写，看到社会对疾病的道德偏见如何扼杀了病人爱的权利，描绘了疾病的隐喻意义对人的精神的摧毁，唤起人们对主人公巨大的同情。所以作者又安排让原是病人的主人公后来成为医生，让主人公具备了医学知识，并了解了病情真相后，解除了关于疾病的精神性负担。但是当作者希望制造更为曲折爱情故事和更为感人的悲剧效果

时，作为文学家的想象视角开始产生作用。他启动了疾病的隐喻功能。安排主人公误以为患“下半身”疾病后，开始忏悔，并以照顾传染性病人的献身之举来赎罪。不料又被传染上“上半身”的疾病，成为一个三期肺结核患者。由于肺结核体现的是生命耗散过程，他可以明确地让人们从病人的咳嗽、咯血等病状中看到生命的衰退，从而引发极大的同情心。小说以主人公下半身病所得到的精神伤害，和上半身疾病所产生的肉体死亡，取得双重的悲剧性效果。

《残春》同样是从医学和文学的双重视角来描写疾病。小说运用双重叙述，将贺君的病症由另一位叙述者白羊君（也是“我”的同学，三人都是留日同学，其身份具有某种共通性，其命运也就有了某种共通性）转述。它实际上写了一位医科大学生“我”与两位病人的交往，一位是从前在国内的同学贺君，在日本得了重病，主要症状就是神经性的癫症，行为不可思议，言语很怪异，但是对绘画有特别的爱好，本来很吝啬，但不惜重金搜求绘画作品。他常常任意停课，别人认为他病了，最后却发现他是呆在家里画画。贺君的病直接与精神狂热有关，由于其极端的行为表现，被世人看作精神错乱的病症。而“我”听了贺君的故事之后，很为世人对贺君偏见而愤愤不平，认为“他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径呢。”并激愤地责问道：“我们这些只晓得穿衣吃饭的自动木偶！为什么偏会把异于常人的天才，当成狂人、低能儿、怪物呢？世间上为什么不多多产出一些狂人怪物来哟？”

由白羊君和看望贺君的故事，又引出了在医院中“我”与看护S姑娘的接触，白羊君对S姑娘的身世的叙述，将“我”引入了梦乡。在梦中“我”与S姑娘相会时，S姑娘自述的病状是“夜来每肯出盗汗，我身体渐渐消瘦，我时常无端地感觉倦怠，食欲又不进”，“我”听了她说这些症候，都是肺结核初期必有的，S姑娘由病引出对生命的悲叹，有生的欲望，又有宿命的苦。小说有一部分是叙述者白羊君介绍姑娘身世的导入性话语（这一部分常为人所忽略）。它提示我们注意到S姑娘的孤儿身分和早熟，且又是一个肺结核患者。肺结核作为一种“优雅的”疾病，桑塔格曾分析其多重隐喻意义：“大概存在着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它引发了结核病的发作，又在结核病的发作中发泄自己。但这样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这些希望必定是被毁的希望。”⁷¹⁾它可以是某种热情似火的情感，诱发了生命力的燃烧耗尽；它的病因也可以是一种自我惩罚的心理暗示，因为社会流行观念认为，病人得病的病因往往在自己，过度压抑或者过度放纵导致身体失衡，都有可能得病；同时肺结核病意味着一种禁忌，在弗洛伊德看来：“禁忌是针对人类某些强烈的欲望而由外来所强迫加入（由某些权威）的原

71)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M]. 文良文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39

始禁制。” 2) 禁忌对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隔绝性，它以绝对的力量将人们所欲望的对象加以禁制，以维护某种社会秩序或道德尊严。肺结核因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且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治愈，因而具有神秘的性质，成为人类不能随便触碰的对象，因此其患者具有禁忌的某种特性。在郭沫若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所爱的对象基本上都是肺结核患者，这些“结核美女”对于有妇之夫而言，就是承载着禁忌性质的象征体。在作者的潜意识中，她们既是爱情意欲的对象，又是情欲的禁忌。小说《残春》描写在梦境中，由于前意识中受道德谴责，主人公“我”对患肺结核的S姑娘的性欲冲动刚一产生，就有夫人的杀子的行为阻止它。小说在结尾处，以红蔷薇和白昌蒲花两种意象互相映衬，红蔷薇代表被压抑的爱情或激情，白昌蒲花则代表着美好的祝福，最后是红蔷薇枯萎，而白昌蒲也凋谢了，受挫的激情和被毁的希望构成了残春的主调。

同理，《叶罗提之墓》与《残春》也有相同性质，“我”暗恋的对象五嫂因患肺结核而死，我也经历了一个死去活来的过程。五嫂和S姑娘一样，既是诱发激情的对象，也是压抑激情的禁忌对象。只不过禁忌的原因有所不同，在《残春》是有妇之夫的道德规范，在《叶罗提之墓》则是血亲关系的伦理禁忌。

郭沫若早期小说带有一种神秘感，其原因在于青春的忧郁，未来人生道路的不可知，再加之在人生的阅历和医学的实践中，有些病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和水平，无法根治，就成为人们恐惧的生命之忧。从宗教的角度，凡是不可知的事物，都会带给人们以神秘感，产生或是恐惧，或是敬畏的心理。就像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中的描绘。当鼠疫到来并在城市扩散之时，引发的社会骚乱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但鼠疫的发病机理的不可知，人们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还会卷土重来，就使作品带上浓厚的荒诞色彩。郭沫若的小说《人力之上》描绘他的一位日本邻居本来就家境贫寒，夫妻俩意外地遭受疾病之灾，雪上加霜，最终家破人亡。这一生活悲剧的发生，让作者感受到人力之上的命运的难以把握，人类终极关怀的怜悯意识油然而生。

IV “腐肉去尽，新肌发生”的民族隐喻

抗战时期，郭沫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代言人，作为政治家的郭沫若，他要分析日本侵略者进行不义战争的“纸老虎”本质，唤起国民的自信，豪情万丈地鼓动民众奋起抗日；同时郭沫若的医学意识也使他看到，在中国倡导科学精神任重而道远，以科学意识启蒙民众，促进民族身心的强健，仍是抗战宣传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以医学的眼光和“手术刀”，继承五四精神，清醒解剖中华

81) 郭沫若. 死的拖着活的. 沫若文集. 第1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

民族的病根，是郭沫若抗战时期话语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新华日报》读到一则“豆腐干”新闻，新闻简略地报道一则案例：一位医学教授作科学研究找不到尸体，不得不发掘公墓而求，结果却被提起公诉。郭沫若从这条新闻引申开去，结合所学的医学知识，从科学研究无法得到解剖材料的事实说起，批判国内社会土葬厚殓的陈规陋习是“死的拖着活的”，数其国民由于科学素质的低劣，导致医学乃至科学落后的原因，是引来侵略战祸的主要根源。他指出，即便是在战争状态，科学战胜迷信的搏斗仍然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1) 医学的视角使郭沫若在政治激情的言说中多了几分客观和清醒，医学的知识在郭沫若的演讲和文章中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医学的意识使郭沫若在组织宣传抗战的过程中，紧紧地抓住国人的身心健康，作为抗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和民族复兴的第一要务。

为加强抗战宣传抗战的效果，郭沫若又充分发挥文学家的形象思维，将大量的医学话语演变成政治和军事的隐喻。由于外力的入侵，中华民族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处境，一贯持“死而复生”观念的郭沫若再次密集地使用疾病意象，用来表达在战争中如何克服国民劣根性，唤起民族自信，共同抵御外来侵略，使民族得以复兴强烈愿望。在关于战争的比喻中，郭沫若主要以“痈”或伤口溃烂来比喻中华民族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因为溃疡是外部的强烈擦伤，经细菌感染后可化脓溃烂，但外部创伤是能治愈的，它不像癌症隐喻那样，代表着死亡。因此，以“伤口”借题发挥，既指出中华民族本身生有毒瘤，战争加剧了毒瘤的溃烂，但同时也包孕着愈合的希望。在文化抗战的宣传过程中，郭沫若在多种场合、多篇文章中反复用一个医学现象来比喻，那就是抗战的过程是一个腐肉去尽，新肌发生的过程，是一个除旧布新过程。我们的停滞不前，好比躯体的腐肉长期积累在那儿，化了脓或有腐烂性伤口。“日本军人正是一大批贪食腐肉的蛆虫，他们满得意地替我们吃着腐肉，这正对于我们的下层的生肌，给与了顺畅地发育的机会”。1) 这篇演讲稿，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简直就是一篇医学讲义。

关于民族的疾病隐喻在散文《痈》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篇散文由“痈”作为文思的触发点，散文从自身胸部右侧生一个小疔子说起，因为有医学经验，知道“疔”需化脓后才能痊愈，因此，为自身的“疔”老是没有化脓而惋惜。不知不觉间，作者高超的想象力来了一个巨大的跳跃，一下从病理现象引申到社会现象，由个人对疾病抵抗，联想到国民对外侮的抵抗，从“脓”的作用一下过渡到对社会时弊的议论，亮出了作者对中国抵抗外侮能力的担忧。随着

9 (72—751) 郭沫若. 关于华北战局所应有的认识[A]. 沫若文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36)

“疔”破脓而出，“我”的情绪又从愤懑转向欣喜：“我虽然是中国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还有抵抗外敌的本领”，“一大群的阵亡勇士哟！你们和外来的强敌抗战了足足十日，强敌的威势减衰下来，你们的牺牲当然不会小”。这时候，作者已经不是在说自己的病情，完全是在为民众拼死抵抗侵略者的英勇精神大声叫好，大呼痛快了。散文自始至终贯穿“伤口”和“痊愈”的巧比妙喻，丰富多变的情感夹杂着巨大恢宏的思想能量。使读者从一篇一千多字的散文中，分享到思想的盛宴。

V 结语

建国后，由于卫生防疫体制的完善和建立，很多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的控制，各种传染性疾病在“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摇”的“送瘟神”运动中似乎被驱逐干净。作为昔日的医生，郭沫若不管是开药方还是诊病因的本领都已派不上用场。而文坛上愈来愈多的高、大、全形象，也让扶风弱柳的疾病意象相形见拙。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实现的远大抱负及信心也杜绝了疾病隐喻产生的温床。这时，郭沫若作品中意气风发的主旋律彻底地驱除了疾病阴影，郭沫若审视社会的医学眼光从此消失了。

作者介绍

陈俐：女，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教授；

通讯联络方式：

地址：乐山市滨河路778号 乐山师范学院 郭沫若研究中心；

邮编：614004；电话0833-2431791；

[电子邮箱chenli202@163.com](mailto:chenli202@163.com)

Guo Moruo: Medical Scientific Insight Covered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Chen Li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 Sichuan , China 614000)

Abstract : Guo Moruo was majored in medical science studies for 8 years in Japan in his early life and was strictly trained with medical and scientific thoughts which offered him unique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old China life and the salvation by medical science . With pathologic methods he revealed natural situations of disease and became a metaphoric critic of disease; While with literary methods he constructed a great number of fictional

or poetic sicken images which contained emotional and rational conflicts. His fictional figure “tuberculosis beauty” was a caressed lover but also a “taboo”. During the period of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War, many medical discours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politic and military metaphors with the interpenetrations of medical and literary thoughts . The “festering” and “curing” for the traumas were lively symbolizations of Chinese people recovering from death.

Key words : Guo Moruo Disease Early fictions Periods of Resistance to JP War

小标题

I 引言：作为“医生”和“病人”的郭沫若

II 早期小说中疾病意象的双重性质

III “腐肉去尽，新肌发生”的民族隐喻

IV 结语

Sub titles:

1. Preface : As a “doctor” and “patient:” Guo Moruo
2. the double traits of sicken images in Guo’s early stories
3. National metaphor of “ the decayed body eroded away but new flesh born”
4. Conclusion